

市场监管

整改外卖起送门槛要算好成本账

点一杯奶茶15元,但凑不够20元不送;点一碗皮蛋瘦肉粥9.9元,也要20元起送。消费者哪怕只喝得下一杯奶茶、一碗粥,也不得不凑单买别的。对此,很多消费者已经习以为常。但据媒体报道,最近浙江某商家因设定外卖“20元起送”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整改。

按照执法人员解释,店铺设定的起送价高于部分食品单价,使消费者不能按需购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者选择权,易诱导过重点餐造成食品浪费,涉嫌违反反食品浪费法。也有网友认为,既然已收取了配送费,那不管消费者买多少钱的东西都应配送,呼吁取消起送门槛。

讨论该不该取消起送门槛,先要了解商家为什么要设置门槛。很多人会忽略,看似20元的外卖销售额并不全是商家收入,里面还包括了给平台的技术服务费、分担的骑手配送费、消费者使用的红包抵扣等。据笔者了解,根据不同地域,每单外卖的配送成本为7元至15元,例如北京地区约为9元。但实际交易中,消费者往往只承担3元左右,其余由平台或商户补贴。也就是说,消费者出的配送费并不够让骑手跑一趟。

外卖起送门槛容易造成浪费,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整改有合理性。但整改目的不是要干涉商家经营,而是要避免浪费。只要消费者用一张张订单投了票,市场自然会帮助商家做出最优选择。

很多时候,配送费还会打折到1元甚至免费,那配送成本就要商家和平台分担。这就意味着,如果商家不设起送门槛,很可能连自己刚性支出的配送费和佣金都挣不回来。要知道,起送门槛并不是平台规定的,而是商家自己设定的。为什么大多数商家将起送门槛设置为20元?因为这是一个经过无数人验证的盈亏平衡点:门槛低了,商家就要亏钱;高了,消费者又会嫌贵,可能就扭头去别家了。

也有部分商家不设起送门槛,但按照实际成本收取配送费。例如北京地区的麦当劳、肯德基均0元起送,不管买8.5元的红豆派还是100多元的全家桶,同样收9元配送费。然而,这又容易触发部分消费者的“包邮强迫症”:一想到要出配送费,好像也没那么想吃炸鸡了。除了大牌餐饮,普通小餐馆

很少有底气收如此高的配送费。餐饮行业大都是小本生意,商家恨不得每天盯着外卖订单计算盈亏,食客也会用足每一点优惠。如果硬性要求取消起送门槛,商家很可能把15元一杯的奶茶涨价到20元,或者按实际成本收取配送费,甚至不做外卖了。届时,不知道消费者能否接受。

截至2022年12月份,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5.21亿,占网民整体的48.8%。算下来,两个上网的人里就有一个点过外卖。城市里,这个比例可能更高,很多人吃碗面都要点外卖。外卖起送门槛容易造成浪费,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整改有合理性。但整改目的不是要干涉商家经营,而是要避免浪费。

判断外卖该不该设置起送门槛,很难简单地法律条文去寻找依据,也不宜归因于

浪费还是节俭的道德标准。这背后是一本商家和消费者都在精打细算的经济账,还带点社会心理学的逻辑。这笔账最终决定了商家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生存和经营,决定了万亿外卖市场的发展前景,也影响到数亿消费者能否吃上一口热乎饭,需要平衡好商家、平台和消费者多方利益。

目前,法律并未明确外卖能否设置起送门槛,只是要求餐饮服务经营者引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建议被责令整改的商家和同行们结合自身实际,如果选择不设起送门槛而是收取配送费,就得努力做成“必吃榜”,让消费者哪怕多出些配送费也要点自己家。如果商家选择设置起送价,平台应引导其在核算经营成本的基础上,优化起送门槛和配送费组合。只要消费者用一张张订单投了票,市场自然会帮助商家做出最优选择。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高端制造,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日前召开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9%,高于临界点,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表现,具有重要意义。

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发展成为总体经济规模全球第二、产业门类齐全、部分部门居世界首位的经济大国。我国虽仍属发展中国家,但经济素质和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说,我国经济过去主要依靠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产业比较优势,即主要靠低成本要素和大量投入而获得国际竞争力,那么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的产业体系将越来越依赖先进制造业,以此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进而获得更强的竞争力与创造力。

当前,我国经济特性和世界产业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我国产业的技术结构体系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过去那种以“引进、吸收、消化”为主的产业技术进步路径,会逐步转向以自主研发特别是以高端产业领域创新为重点的产业技术进步路径。

那么,如何持续建设高质量的工业?先进制造业将担当起“领头羊”角色。只有形成先进制造业的雄厚基础,实体经济的根基才能扎实牢固,整个社会经济才能欣欣向荣并实现可持续。

要充分意识到,就我国经济的结构特质来讲,先进制造业在产业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无论是对于国力还是民生,实体经济都不仅是根基所在,而且是主体结构的普遍形态。虚拟经济也只有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才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高质量发展先进制造业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还要依靠自主创新,也要具备创新人才和应对国际竞争的体制机制,包括科技创新的人才体制机制。科创人才只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发扬探索精神,并受到社会尊重、获得必要的物质与精神支持,就可以成就更多技术创新,硕果累累。

特别要指出的是,以自主创新为主发展先进制造业,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才能海阔天空。谁开放谁进步,谁封闭谁落后,这是产业发展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变的规律。先进制造业具有极为复杂的技术体系结构,其在本质上是全球性产业;技术要素来自全球、产品市场与资源配置遍及全球。因此在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舞台更是世界性的。

进一步讲,发展先进制造业要有超前的意识。就技术水平的定义内涵,所谓“先进制造业”,是相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的,不同时代的先进制造业各有其技术特征,所谓“先进”与“传统”的技术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在传统技术中,可能有先进技术的萌芽空间和突破启发。发展先进技术也需要传统技术的贡献。当下,先进制造业不仅仍然具有基础产业的性质,而且突出地具有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特征,各种科技因素都可能植入制造业领域,形成先进制造业的科技养分。

先进制造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技术探索普遍逼近基础科学的前沿领域,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往往涉及基础科学的尖端探索,甚至需要具有基础科学专长的优秀科学家直接参与产业创新事业。因此,一些科研单位、研究型高等院校,可以在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研究开发和突破中,发挥科技尖兵的作用。

高质量发展先进制造业,更要加强战略统筹谋划,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上,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要强化支持先进制造业的政策导向,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先进制造业流动,形成有利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还要坚持优化布局、集群发展,加快中国智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莫让“帮信”有可乘之机

臧梦雅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湖南长沙打工的彭某两年前因出售自己的银行卡供他人使用,被判犯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日前获刑。类似彭某的情况并不鲜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增设8年来,有逐渐增多趋势。

所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是指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还为其提供帮助的行为。调查发现,此类案件涉案人员以学生、无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偏低的人群居多。他们往往社会阅历不够,或是贪图“蝇头小利”,殊不知已成为电信诈骗链条上的一环,沦为“帮凶”。还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换个账号”“套个现”无所谓,而其实这些不正当行为助长了非法团伙的气焰,更对自己的工作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

从案件情况来看,违法行为以非法买卖银行卡、电话卡为主。他们或利用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为他人代收款,再转账到指定账户,从中赚取佣金,充当跑分的“工具人”;或非法获取并提供批量社交媒体账号、“解封”封禁账号,无形中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电信诈骗诈骗案件办理得多,带出的“帮信罪”案件就多,这背后也折射出网络治理、社会治理等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近几年,有关部门加大了打击

利用信息网络犯罪和相关犯罪的政策力度。2020年10月份,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断卡”行动。当年12月份,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惩戒治理非法买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加强对买卖“两卡”行为的源头打击。

要想有效降低“帮信”案件数量,必须从源头治理、前端预防,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要加大对利用互联网进行诈骗犯罪的综合整治力度,健全监管机制,对涉案专业技术人员实行黑名单制度。

要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发生的信息链、资金链、技术链、人员链等各环节,通过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建立长效防范机制,强化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变重点打击为“人防管控”并重。

此外,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和电信相关部门来说,应严禁违规办理银行卡、电话卡等业务。针对普通网民,尤其是利用网络求职的高校毕业生、无业人员等群体,则要积极开展法治教育,提醒他们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盲目相信“高薪包就业”“赚快钱”等虚假宣传,以免受了骗还在“帮别人数钱”。

(中国经济网供稿)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异地就医也能“一卡通行”

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添惠民新举措。4月1日起,京津冀三地参保人员在区域内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即可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实现“一卡通行”。这将为三地群众异地工作、养老和就医提供更大便利。尤其是对于经常往返三地的参保人员来说,减少了频繁备案的“烦恼”。接下来,三地还应进一步强化医保待遇、支付方式、医药服务、基金监管等领域的政策协同,更好满足参保人员对医保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应持续开展京津冀药品和耗材联合带量采购,减轻老百姓医药费用负担;推进医保基金互联互通,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时 锋)

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当前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农业技术和装备支撑。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的耕地和水资源有限,要实现农业稳产增产,牢牢端稳“中国饭碗”,根本还是要靠科技支撑的作用。

强化农业技术和装备支撑,是指通过农业科技的进步、农机装备的推广应用,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回报率。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信息化等应用水平得到提升,推动我国由传统农业向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快速转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优化农业农村部职责,其中包括将国家乡村振兴局、科技部的部分涉农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这也凸显出科技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

但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在核心种源、关键装备等领域还有不小差距。对此,需要加快实现种源自主可控,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等,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第一,要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水平。要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增强创新效能,构建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聚焦科技研发资源,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突破

“卡脖子”技术和制约瓶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稳定供应至关重要,可努力推广新技术和新品种,加强种子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积极培育新品种,研发一批高产、高品质的种子,在玉米、大豆、蔬菜、奶牛、家禽等领域实现突破。

第二,要提升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加大对农业装备的投入,加强先进农机研发推广,推进农业科技装备全领域突破,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施化、智能化。可研发适宜的小型农机,园艺机械、植保机械等,提高作业效率,帮助农民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针对现代化农机价格相对较高的情况,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补贴农机购置等措施降低购买门槛,提高农民购买农机的积极性和使用率。

第三,要鼓励科技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的投入大、科技含量高,小农户的精力有限,需要科技企业“下乡”支持,因地制宜创新种植、养殖技术,创办新型农业企业,打造现代农业生产标杆,促进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要引导和推动各级学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等提供科技培训、科普讲座、产业指导等方面的服务,推广普及相关技术知识。平台企业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重构农村市场商业模式,助其融入全国性大市场,更好地实现农产品输出与农资输入,提高产业的流通周转效率。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就业总量压力仍然存在。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将达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如何高质量确保就业主体就业,既关系宏观经济,也关系万家灯火。在数字经济时代,就业环境摆脱了时空限制,就业方式突破了单一关系,就业机会满足了更多个性化需求,可以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更多选择。

按照目前职业发展的趋势,未来5年,数字经济有可能创造300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为了适应数字经济时代职业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新增职业168个,取消10个,净增158个;共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占职业总数的6%。职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高质量就业的基本要求。高质量数字化转型的求职者,比如数据分析师、人工智能培训师等优秀数字化人才,更容易实现高质量就业。

但应该看到,当前无论是职业数字化转型,还是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就业创业的提振作用都存在一些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提出了一些更高要求,但我国现有的学科设置和教学模式与数字经济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不能充分匹配。目前,多数高校的工业数字化和农业数字化师资队伍建设仍

提升中国饭碗

张玲

科技含量量

畅通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堵点

韩 晶

推动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就业,就要打破制约数字经济就业创业的难点堵点。应加强高校毕业生数字化技能的培养,推动就业创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数字新职业的社会兜底保障功能。

然而,学科建设不足,难以匹配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的要求。

数字经济的虹吸效应也加剧了数字人才流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是数字经济人才净流入地区,其他地区的数字化人才更加缺乏,数字经济对就业创业提振效果的区域差异明显。我国大部分数字化人才集中于第三产业,相对服务业数字化人才规模体量过剩来说,工业数字化和农业数字化不但蓝领技术人才存在缺口,复合型高端人才也较为紧缺。此外,数字平台企业的不规范用工问题也比较突出。数字经济利益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以零工身份受雇的多数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亟待完善。

推动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就业,就要打破制约数字经济就业创业的难点堵点,筑牢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就业的根基。

加强高校毕业生数字化技能的培养。应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按照“新工科(新农科)建设+新职业

确立+新实训搭建”的要求,增加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学科专业,建设数字经济研究平台和实验室,夯实数字经济专业人才培养基础。加强校企合作,促进产学研融通,将数字经济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学生专业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推动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推动数字经济就业创业结构优化升级。从国家层面而言,应把产业数字化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中,加强中央对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快布局“东数西算”算力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转移渗透,实现“东技西用”。通过税收优惠、数字金融等方式,鼓励工业和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强化数字新职业的社会兜底保障功能。要适应数字新业态的就业特征,多措并举保障数字经济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完善适应新型就业形势的劳动保障制度,尤其是针对新业态形态劳动者的社保缴费分摊制度、劳动权益与工作福利等,作出全方位保障。构建规范发展的数字经济就业创业政策体系,补齐成长中的短板,明确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责任和义务,适时调整相关的法律法规,覆盖数字经济就业创业人群。